

史实与史论:商路·商帮与经济社会发展

——2018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综述

刘锦增 张舒

由中国经济史学会和山西大学主办,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的“2018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暨商路·商帮与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8月25日至26日在山西太原举行。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110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306名经济史专家、学者与会。《清华大学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城市史研究》等期刊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单位参会。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近180篇。

主题报告阶段,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教授详细分析了1945年重庆黄金提价泄密案。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通过对中国百年老企业案例的分析,揭示了其从学习到竞争乃至超越的具体路径及启示。中国社科院李毅研究员指出,当前中美贸易争端本质上是一场以制造业发展为中心的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大国实力博弈。中国社科院郑有贵研究员以1978—2018年牛城兴起和转型升级的具体案例为基础,指出乡村振兴需要构建共享发展机制。山西大学刘建生教授结合日本、俄国资料就清代晋商对俄贸易及其路线问题进行了分析。南开大学许檀教授以碑刻资料为中心考察了清代华北药材市场。武汉大学陈锋教授从四个方面对清代盐政管理系统中的基层官吏盐场大使进行了探讨。辽宁大学韩毅教授分析了美利坚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河南大学孙建国教授分析了晋商关帝信仰与社会网络构建问题。上海社科院张忠民研究员提出,对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研究应侧重对企业制度生成来源的考察分析。天津社科院张利民研究员就中国近代城市捐税制度建立的内因和外因做了深入分析。下面就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及发言情况,作简要评述。

一、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中国古代经济史主要围绕工商业史、财政史、货币史等方面展开讨论。

中国古代工商业史方面。朱德贵(哈尔滨商业大学)《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商业问题探讨》利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重新分析了东汉时期的商业状况,认为东汉中期商品交换异常活跃,货币经济发达。陈志刚(兰州大学)《明代的川藏茶叶贸易及其社会影响》分析了明代川藏茶叶贸易的市场变化,认为川藏茶道加强了大渡河沿岸土司依附内地的社会特征,使川藏交汇地区成为汉藏民族交往的地域重心。吴志远、张民服(郑州大学)《清代河南地区的土地交易——基于文献和契约的考察》利用方志和洛阳地契分析了清代河南地区的土地交易。张亚兰(山西财经大学)《从几则案例看清代行会制度对改善营商环境的作用》指出,清代行会制度对改善营商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对当代营商环境的改善也具借鉴作用。杨帆(河北大学)《晋商茶叶规程中的商人生活——以〈恰克图贩茶歌〉为例》利用晋商茶规中的《恰克图贩茶歌》解读了晋商的社会经济生活。

中国古代财政史方面。黄纯艳(云南大学)《宋代财政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其检讨》总结并检讨了以往宋代财政史的研究方法。唐晔(河北大学)《由钱荒看宋代市场经济发育》认为宋代并不存在

[作者简介] 刘锦增,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讲师,太原,030006,邮箱:564110997@qq.com。张舒,山西省社科院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太原,030032。

钱荒,而是钱在流通环节出现问题。程利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明代顺天府财政探析》通过分析明代顺天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得出当地正额财政支出量大于收入量。

中国古代货币史方面。王文成(云南社科院)《从铁钱到银两:两宋金元纸币价值基准的演进》认为,两宋金元纸币的价值基准完成了从铁钱到银两的转换。纸币价值基准转换的完成,不仅奠定了元明时期纸币发展由盛转衰的基本方向,而且标志着货币标准白银化完成,中国货币体系由铜钱时代进入了银两时代。何平(中国人民大学)《从中国纸币使用的历史实践看货币形式的选择——从北宋的交子到央行数字货币》梳理和分析了宋、元、明三朝纸币的流通及其性质。邱永志(江西财经大学)《明代为何转向白银时代?——基于制度原因的新考察》认为,明初国家社会经济制度上的承继与变革是促使明代货币转型最终定格在民间称量银的背后体制原因。魏晋(文化与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钱庄渊源考》通过考证得出钱庄大体出现在康熙中后期。李义琼(浙江师范大学)《库价、京解与帑银:白银财政分配视角下的晚明浙淮盐法变迁》认为,晚明两浙为保障盐课收入而强制商人登记以获取专卖权的纲纪制度是明清盐法从官专卖向商专卖制转变的更早标志。

此外,胡玉春(内蒙古社科院)《匈奴手工业发展考论》考述了匈奴的畜产品加工业、冶金业、制陶业、木器制造业、车辆制造业。苏金花(中国社科院)《再论中国古代的糜子》利用西北出土文献以及传世典籍,重新探讨古代糜子的植物属性、种植周期、名称流变以及用途。周明帅(陕西师范大学)《“田地零散化”视域下官府与农户的应对机制探究——以中古时期敦煌、吐鲁番地区为中心》分析了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的官府与农户为减少田地零散带来的弊端所采取的措施。田晓忠(云南大学)《“富民”与宋代乡役制度变迁:再论宋代“富民”与国家关系》认为,宋代乡村职役的构成及制度变迁反映了“富民”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和互动,是“富民”与国家之间力量对比与利益实现的反映。

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中国近代经济史主要围绕企业史、商帮商贸史、财政金融史等方面展开讨论。

中国近代企业史方面。杨在军(河北经贸大学)《中国近代民营企业制度的内源路径及其制度特征研究》对中国近代民营企业制度产生的内源路径进行了梳理。郭岩伟(西南财经大学)《论近代外商在华企业中的发起人股》分析了近代外商在华企业的发起人股制度的演变进程。李钢、王树森(中国社科院)《国有企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定位——以招商局为例》从招商局出发,探讨了国有企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

不少学者以个案为例分析中国近代企业。常忠义(河北大学)《近代张家口商业地产开发与商铺出租剖析——以怡安公司历史档案为中心》以档案为中心剖析了怡安公司商用房地产开发特性以及张家口近代工商业所需铺房以租赁为主的格局。王玉茹、张阳(南开大学)《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集聚与扩散——以近代上海工业为例》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分析了上海工业集聚的原因,认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是决定工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常屏京(武汉大学)《晚清民国时期武汉地区制粉业的工业化》分析了晚清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以前武汉地区制粉业的曲折发展。顾纪瑞(江苏社科院)、顾乃熙(江苏华隆兴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从顾氏家族投资庆丰公司看中小股东在股份制中的作用》以庆丰公司为例,对中国早期大型股份公司的股份变动深层状态作了翔实的个案剖析。方书生(上海社科院)《民国时期火柴业市场结构的演化及绩效——以刘鸿生火柴企业为中心》以时间为序,解析民国时期火柴业市场结构的演化,继而分析了四个阶段中多种类型市场结构演化的绩效与特征。

中国近代商帮商贸史方面。关于商帮,张荣杰(内蒙古工业大学)《清至民国归绥回商与丝茶驼道变迁研究》论述了清至民国丝茶驼道贸易网络体系的形成、发展、衰退、延续的过程。王静(天津社科院)《近代天津鲁商的经营活动》分析了鲁商在近代天津的经营活动。王雪梅(四川师范大学)《抗

战时期宁波“商帮”在重庆的工商业和社团活动》探讨了抗战时期宁波“商帮”在重庆的工商业和社团活动。孙善根(宁波大学)《近代宁波商帮及其史料整理研究述评》梳理了近代宁波商帮研究的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其中的成绩与不足,认为制约宁波商帮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文献资料发掘和整理的滞后。

关于商路、商贸活动,卢征良(西南民族大学)《从垄断到竞争:近代藏区边茶贸易市场体系的变迁》运用市场垄断理论,探讨了近代藏区茶叶市场体系的变迁。佳宏伟(厦门大学)《十九世纪末通商口岸的药材贸易与流通网络——以天津、上海、汉口和广州为中心》以药材贸易为考察对象,分析了药材贸易的经济史意义,并对目前医史学界关于晚清医学的若干认识进行了反思。康健(安徽师范大学)《晚清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研究》对晚清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的缘起、西商赴俄贸易中的商人与商号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杨红伟(兰州大学)《近代西北羊毛贸易研究的几个问题》反思了近代西北羊毛贸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张博锋(华侨大学)《近代以来丹江商路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以丹江水运为对象,考察了近代以来丹江商路与区域经济社会变迁之间的联系。

还有一些学者关注近代商人家庭问题。刘锦(南京审计大学)《变与不变:上海沙船商人家庭近代转型中的两面性——对“沈生义”家族衍变史的考察》以沈氏家族的衍变史为考察对象,探讨了上海沙船商人家庭近代转型中的变与不变。魏春羊(山西大学)《晚清山西中小商人的家庭教育——以“武氏家书”为中心的考察》以“武氏家书”为核心史料,分析了晚清山西中小商人武振德的家庭教育。

中国近代财政史方面。王燕(武汉大学)《晚清印花税的引进与窒碍》从档案入手,对印花税在清末没有大规模开办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熊昌锷(中国社科院)《晚清浙江厘金的开征及收支货币结构》以浙江省厘金为例,讨论其确切的开征时间及存废变化,并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销档案对罗玉东的研究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并对其货币结构展开分析兼及讨论厘金对晚清地方财政及政局的影响。刘巍(安徽财经大学)《民国时期遗产税制度的讨论、设计与实践》对民国时期的遗产税制度进行全方位考察,并展望当前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前景。刘五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民国时期中原植烟区农民的非税役负担》分析了民国时期中原植烟区农民的非税役负担,认为他们除了承受与粮区农民一样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外,还要承受物价负担、高利贷的侵蚀、军政的滥罚款等。李叶鹏(清华大学)《整理合理负担与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基层征收秩序的确立》通过分析官方文献和基层账本,发现中共在太行、太岳地区确立了有效基层征收的秩序。

还有一些学者围绕近代以来的“公债”展开讨论。刘杰(南昌大学)《现代“公债”概念的生成与晚清政府财政实践》通过梳理“公债”这一名词进入中国的路径与传播过程,进而阐明“公债”的概念及早期财政制度实践。马金华(中央财经大学)《近代中国的政府债务与盐税抵押》分析了盐税与政府债务从开始建立联系到构建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再到切断联系的过程,并由此揭露了近代中国政府债务对盐税的高度依赖及各届政权经济基础的落后性。

中国近代金融史方面。燕红忠、李裕威(上海财经大学)《近代内汇市场汇价的决定及其影响因素》从利息和洋厘行市出发,考察了两者对汇水或汇价的影响以及货币市场与内汇市场的关系。马长伟、李莉莉(安徽师范大学)《银行资本、政府导向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认为由于中国政府未能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起到应有的正面引导作用,使得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不能互为推动,工业化进程缓慢。许晨(中央民族大学)《近代福州民间货币市场发展及其信用机制研究》运用中、日文史料,系统阐述近代福州货币市场的发展状况,并探讨了其中的信用机制。龚关(南开大学)《民国时期华南区域金融市场研究》从对外贸易、金融机构、侨汇、货币制度等方面对华南区域金融市场进行了研究。

不少学者围绕近代山西票号展开讨论。万立明(同济大学)《试论近代中国票据信用的制度创新

及其启示》借助于制度创新分析的一般理论,探讨了近代中国在交易性票据的创设、票据中介组织的本土化、规范化的票据中介机构的创设等三方面的制度创新及其现实启示。周建波、曾江(北京大学)《清末银行的发展与山西票号的兴衰》从制度创新与业态竞争视角,考察了清末银行与票号的发展历程,并由此揭示了这两大金融业态的历史命运轨迹。刘秋根(河北大学)《清代民国放账铺:传世文献与民间文献》分析了清至民国的放账铺。周亚(山西大学)《票号书信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同治年间协同庆信稿为例》以协同庆票号同治九年至十年的书信为例,对这类书信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价值予以阐释说明。陈添翼(河北大学)《晚清民国汾河谷地账局与乡村典当借贷——以恒益典书信为中心》以恒益典书信为中心,考察了账局对乡村典当放贷的经营情况。

除上述四个方面外,还有一些学者围绕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其他课题展开了讨论。郝平(山西大学)《从民间契约看清徐乡村亲邻先买权制度的衰落》从东青堆村契约入手,围绕东青堆王氏家族这一个案,揭示晚清民国时期清徐县乡村亲邻先买权制度的变化情况。袁为鹏、高廉(中国社科院)《全国县以下镇市村落调查(1930—1933)数据库简介》利用该数据库,统计了民国时期全国各省县以下镇市村落数量及其人口规模。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主要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史研究、农村集体经济以及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等方面进行讨论。

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史研究方面。魏明孔、丰若非(中国社科院)《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回顾和总结了近40年我国经济史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对我国经济史的未来进行了展望。于文浩(中国社科院)《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经历了从“成套技术引进与模仿”到“市场换技术与模仿创新”,再从“集成创新和二次创新”到“集成创新、二次创新、协同创新和原始创新并举”的自主创新型发展轨迹。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变迁及特征探析》指出,改革开放40年间,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变迁大致经历了普遍性设立和深化改革、快速发展两个阶段。王蕾(中国社科院)《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历程与启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经历了对外经济开放启幕、对外经济开放格局初步形成、在多重调整中纵深推进、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形成对外经济开放新格局、持续推动对外经济开放6个阶段。焦建华、李文溥(厦门大学)《先行先试、先发优势与领先发展——厦门特区改革开放经验之探讨》认为,坚持对内改革,先行先试,积极创新是厦门近四十年来领先发展的经验。

农村集体经济方面。彤新春(中国社科院)《重视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认为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轨过程中,必须重视农村集体经济。高春平(山西省社科院)《山西农业近七十年的回顾与思考》回顾了山西农业近70年的发展历程。张连辉、李进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抗性良种培育与推广》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主要围绕抗病良种展开。然而,受相关制度体系建设和经济激励不足制约,其进展缓慢。

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的考察。段艳、陈耀(贵州省社科院)《中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的回顾与思考(1949—1978年)》认为,1949—1978年中国各大区域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发展不理想。刘文斌(山西大学)《晋煤外运发展演变与改革调整研究:价值、进展与方向》认为,随着资源型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强,晋煤外运面临新的要求。

一些专门问题的探讨。吴茂国、李怡良(上海大学)《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测度、时空分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BM-DEA与ESDA-GWR两阶段模型》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对不同区域在提高水资源绿色效率和优化产业结构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李彦超(中国社科院)《我国钢铁工业的资本形成机

制:1949—1978》认为,1949—1978年间,我国钢铁工业是以行政计划为主导的资本形成机制,奠定了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基础。霍知节(内蒙古师范大学)《走向稀土大国的创新之路——包钢稀土一厂复产和扩建及产品研发(1964—1978年)》指出依靠自力更生发展高科技是走向稀土强国的根本道路。

四、外国经济史研究

外国经济史研究围绕美国、日本等国经济史展开讨论。

林珏(上海财经大学)《战后美国制造业结构调整与转型研究及启示》分析了战后美国制造业的两次结构调整与转型。马金华(中央财经大学)《美国进步时代预算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实现路径》从国家治理视角研究了美国进步时代的预算改革。许天成、罗良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历史考察(1947年底至1950年8月)》分析了杜鲁门政府从1947年底到朝鲜战争爆发前,为推广“战略禁运”而在美国国内所作的技术性和理论性准备工作。作者认为,加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能够为中国预测当前美国在可能的贸易战中所采取的国内外政策提供历史借鉴。刘绮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战后日本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发展演变研究》分析了二战后日本经历了“贸易立国”、“技术立国”和“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发展阶段,并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科技创新体系。董德琴(山东省海洋经济文化研究院)《1868—1886年间日本产人参的对华出口趋势及原因试析》通过对明治期日本产人参出口情况的分析,阐明了当时日本传统汉方药业及其经营在向近代企业转型的过程中的相关影响因素和政治、经济制度的联系。

此外,倪月菊(中国社科院)《一带一路框架下澜湄地区纺织服装产业价值链的发展》探讨了一带一路对澜湄地区纺织服装产业所起作用。施诚(首都师范大学)《英国革命与财政》分析了近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英国财政结构的变化。刁莉(武汉大学)《近代全球化视野下的中俄贸易(1862—1919)》梳理了近代中俄贸易发展的历程。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中,与会学者围绕“商路·商帮与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次会议论文呈现以下特点:其一,注意把握历史脉络与现实关怀。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经济史研究要多关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国家服务。李毅、许天成、罗良文等学者围绕中美贸易问题,从历史上寻找依据,并提出了应对策略。兰日旭、刘巍、于文浩、王蕾、焦建华等学者分析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倪月菊、张晓玲、刁莉从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上述选题充分体现了经济史学者“传、承、担”的历史责任。其二,档案文献与民间文书的运用。本次会议参会论文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史料新。学者们不仅关注传统史料,还注意对各地的档案、新出土文献、各地民间文书、碑刻资料等的运用。其三,理论反思与实证研究。此次会议中,学者们还注意对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反思,如魏明孔、毕学进等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黄纯艳、田晓忠、汤文博等学者对以往宋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方法进行了反思;杨红伟反思了近代西北羊毛贸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其四,充分体现大历史与小历史的结合。与会学者所提交的论文既有宏观层面的论述,又有微观层面的分析。其五,跨学科与地域视角的运用。经济史本身就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从提交的会议论文来看,学者们既注意借鉴考古学、计量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又注意研究地域的选择。

(责任编辑:王姣娜)